

外教社新编外国文学史丛书

◎ 郑克鲁 著

法国文学史 下卷

(第二版)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II

La Deuxième éditio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外教社新编外国文学史丛书

◎ 郑克鲁 著

法国文学史 下卷

(第二版)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II

La Deuxième édition

下 卷

第六章

19世纪下半叶文学

第一节 概述

一 历史文化背景与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文学思潮

从法国文学的发展历史长河来看,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文学似乎是一个过渡阶段,即从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现代主义文学的中介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越来越对世界文学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说,古典主义和启蒙文学对欧洲各国文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那么,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文学则将其影响扩展至世界各国。

【历史文化背景之一——第二帝国】 这一文学时期包括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两个时代,第二帝国从1851年至1870年,第三共和国从1870年至1940年,跨越了两个世纪。第二帝国的皇帝路易-拿破仑(1808—1873)是拿破仑的侄子,在瑞士长大。他在图纳军校学习过,成为炮兵军官,1831年参加意大利自由党人的起义。在拿破仑的儿子去世(1832)后,他被看做波拿巴主义者的真正领袖。1836年他在斯特拉斯堡密谋反对七月王朝失败后,流亡到巴西、美国和英国。1840年正当拿破仑的骨灰被运回法国时,他在布洛涅组织了第二次密谋,仍告失败,被关在哈姆要塞。1846年他化名巴丹盖,穿上泥瓦匠的衣服,设法逃到英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他回到法国,4月被选入立宪议会。他在《拿破仑的思想》(1939)中,提出了“民主的凯撒主义”的观点,在《消灭贫困化》(1946)中提出了他的经济理论,后一部著作深受圣西门的影响。当时,人民怀念拿破仑,资产阶级又担心六月起义的“红色危险”,这使他受到秩序党的支持,成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候选人。1848年12月10日在选举中他获得绝大多数支持。在拥护者的支持下,他巧妙地让立法议会的保守派施行反动政策:1849年出兵罗马,1850年取消普选,但他表面上是主张普选的,又以工人和宗教的保护者自居。宪法规定1852年再次选举,由于他无法修改宪法,便在一批政客的支持下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宣布解散议会,通过公民投票,新宪法允许建立帝国。1852年12月2日,他成为拿破仑三世,实行专政:镇压共和派和正统派,官员要宣誓效忠,取消报纸自由。对外他实行好战政策和殖民扩张政策,如征服塞内加尔,但在墨西哥遭到了失败。19世纪60年代他对内放宽了政策,给予报纸一定的自由,工人有结社权。1870年7

月法国向普鲁士宣战,9月2日法军在色当全线投降,拿破仑三世成了俘虏。9月4日议会宣布皇帝退位,他流亡到英国。拿破仑三世以极其可耻的方式下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个被雨果蔑称为“小拿破仑”的野心家,给法国蒙上了耻辱。

【历史文化背景之二——巴黎公社】 普鲁士军队围困了巴黎,1871年1月临时政府与普鲁士签订了和约,2月在波尔多成立了国民政府。面对丧权辱国的局面,1871年3月18日共和派和巴黎工人起义,26日经过全民选举,巴黎公社诞生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为生存而战,但只坚持了两个多月。5月21日,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最后一批公社社员壮烈牺牲,“五月流血周”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三万社员被屠杀,四万人被判处苦役或流放,有的公社社员逃往国外。直到1880年大赦,流放者和流亡者才得以返回国内。

【历史文化背景之三——经济发展】 与普鲁士签订的和约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并赔偿50亿法郎。普法战争的起因本来是欧洲大陆的两个大国的国际利益冲突。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的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法国和普鲁士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但是这种冲突并不以一方的败北而结束。俾斯麦本来企图以巨额赔款使法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穷财尽,可是事与愿违。法国提前付清了赔款。随后复仇的呼声和希望法德和睦的舆论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当时法国经济复兴相当快。19世纪的最后30年,法国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佩吉说过,1910年之前的50年,法国的发展超过了纪元开始以来的进展。1852—1856年法国铁路从3000公里延长到6500公里,1870年铁路总长已达到17500公里,至1892年又翻了一番。汽车工业出现了:1891年法国制造出第一部汽车。1903年汽车时速已达到103公里。汽车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中。电报局1880年在法国有5000家。电话在1879年开始有用户,仅四年后,在巴黎就有4000个用户,比外省略少一些。1898年,杜索向医学科学院展示了一台电动留声机。1895年,吕米埃尔兄弟举行了第一次电影放映,从此,电影与小剧场和音乐歌舞厅展开角逐,并取而代之。电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属于一门大工业。1889年的博览会庆祝大革命一百周年,艾菲尔铁塔的兴建显示了先进的建筑技术。巴黎出现了大百货公司、大规模的信贷银行、股份公司和交易所。为了举办1900年的博览会,塞纳河上的亚历山大三世桥以及小王宫和大王宫相继落成。由于使用电灯,巴黎成为“光明城”。歌剧院在1875年建成,巴黎公社时期被烧毁的市政厅于1882年重建。1900年第一条地铁正式运营。1890年,巴黎大约有250万人口,而郊区人口1891—1911年间增加了一倍。教育改革也取得了成就:确定了初级义务教育,女子能接受中等教育,设立幼儿园,对教会办学进行限制。经济繁荣带来了社会的兴旺气象,促进了文化消费,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历史文化背景之四——政治状况】 19世纪最后30年共和制得到确立。1875年通过的宪法导致次年的立法选举。总统权力受到严格限制。1879年,《马赛曲》被定为国歌,1880年,国庆节被定在7月14日。民众获得报纸和集会、参加工会和结社自由。8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重新获得发展。1887年,18位议员组成的“工人”党团在议会产生。从1890年起,盖德领导的法国工人党迅速发展。饶勒斯、密勒朗等社会党人于1893年入选议会。1892年劳动交易联合会成立了。皮埃尔·普鲁东(Pierre Proudhon, 1809—1865)的著作促使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普鲁东当过印刷工人、印刷厂主、诉讼事务所和政论家的雇员,同时研究哲学、宗教史和政治经济学。他的理论主要反映在《政治组织原则》(*Principes d'organisation politique*, 1843)、《贫困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1846)、《经济矛盾体系》(*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1846)中。1894年发生暗杀总统萨迪·卡尔诺事件。尽管国家法律严厉打击无政府主义,其影响仍然很大,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政治生活中,有三件大事引人瞩目。一是布朗热将军事件。他于1886年1月任国防部长,在施奈布莱事件中采取敌视德国的态度,他周围形成了由希望复仇的民族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甚至保王派组成的反对派。他被看做复仇将军和最能推翻共和制的人物。他担任13军团司令前往克莱蒙-费朗时,支持他的民众在火车站举行了示威。1888年他离开政府后,又参加选举,受到过激共和党人的支持。他的拥护者组成“爱国者联盟”。1889年1月,他在选举中获得大胜,却不敢向总统府前进,使政府获得时间以采取措施反对他。内政部长指控他阴谋反对政府,威胁要逮捕他,并解散他的联盟。于是布朗热逃到国外。他被缺席判处无期徒刑。1889年4月,他在比利时情妇的墓前自杀。布朗热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与消失,震动了许多人的心灵。

二是巴拿马运河丑闻。这是第三共和国最大的金融丑闻。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者费迪南·德·莱塞普斯从哥伦比亚政府那里获得领土租让权,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以建造巴拿马运河(1879—1881)。他低估了工程的技术困难,工程师原来预计费用是12亿法郎,实际费用要大得多,于是他向公众和金融家求援。一大部分收集来的款子用于宣传计划。1887年他放弃了原先想法,请艾菲尔来建造运河,重新借款,并从政府那里获得准许发行债券。但公司于1889年2月倒闭,拖累了80多万人。政府与金融界上层勾结,向公众隐瞒,一直拖到1891年丑闻才曝光。调查的结果牵涉到一些金融巨头,莱塞普斯被判五年监禁,一些工程师,包括艾菲尔被判两年监禁。在受牵连的一百多名议员中,只有巴伊奥部长承认接受贿赂并被判刑。在这场丑闻中,政府和当权的共和派声誉扫地。

三是德雷福斯案件。德雷福斯(1859—1935)是法国军官,出生于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家庭,在国防部参谋处工作。他被指控出卖军事情报给德国驻巴黎的武官,于1894年10月被捕,受到军事法庭的草草审判,12月被流放到圭亚那的魔鬼

岛,其间报纸和军队掀起了第一次反犹浪潮。1896年,情报处新任领导皮卡尔确信犯罪者应是埃斯泰阿齐,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埃斯泰阿齐被传讯至军事法庭,1898年1月却被宣告无罪。这个案件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民众分成两派,支持德雷福斯的有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反军国主义的共和派(集合于“人权联盟”中),而反对德雷福斯的有右翼民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教权主义者(集合于“法兰西祖国联盟”中)。随后,皮卡尔被调到突尼斯。1月13日,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总统菲利克斯·富尔的公开信《我控诉……》,据理为德雷福斯力争,指责军方玩弄阴谋,为虎作伥,当局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结果左拉以“污蔑军队”的罪名被判监禁和罚款3000法郎。不久,放在德雷福斯档案中的假文件被发现,其作案者亨利上校不得不自杀。这时恰好总统去世,左派联盟上台,事情获得转机。案件于1899年重审,但8月举行的军事法庭只把德雷福斯的判刑减轻为十年徒刑;几天以后,他获得赦免。德雷福斯案件远非一个错案,它反映了第三共和国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引起右派和左派政治力量的重组。直到1906年军事法庭才推翻前判,德雷福斯恢复军阶,重返军队。1930年那位驻巴黎的德国武官的笔记发表,才最后澄清了事实。

上述三个事件都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得到反映。

【历史文化背景之五——科技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是科学技术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科学发展不仅对经济和互相冲突的思想潮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和1855年的巴黎世博会证明了法国工业的发展。这是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企业建立了研究实验室,以制造最好的染料、最有效的肥料、最强大的炸药。蒸汽机、内燃机、电机的制造比速度,比产量。火车1842年的时速为17公里,1860年提速到每小时70公里。电灯照明逐渐代替了煤气灯。能量守恒定律确定了世界物质的统一性。1873年麦克斯韦证实的光的电磁理论几乎囊括了一切物理领域,再次证明了这种统一性。原子理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化学元素周期表阐明了物质构成的一致性。研究生命体的结果是获得了自然界的新观点。《物种起源》(1859)于1865年被译成法文。达尔文指出,一切生物在环境的作用下都会根据自然选择的规律产生改变。命定的普遍和谐的信念和神造说都被动摇了。克洛德·贝尔纳从生理学中排除了“生命力”的概念,而贝尔特洛已将这种概念从化学中排除出去了。贝尔纳认为,一切生命现象,包括精神现象,就像物理—化学现象一样,服从严格的决定论。关于世界的形而上观点受到根本动摇。巴斯德把科学和宗教分开,认为学者在实验室之外是信仰者,他以此避免了来自教会的攻击。1895—1896年电子的发现是一重大事件。1900年普朗克提出了能量和光也有物质结构。1896年,贝克雷尔和居里夫妇发现了放射性物质,对放射性物质的研究迫使学者放弃原子不可分割的假设,而这是机械论的基础。

【历史文化背景之六——哲学思想的流播】 科学研究的重大进展及技术取

得的巨大进步,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唯科学主义者认为,根据某种科学,可以解决一切哲学问题,而这种科学的可能性是根据社会实践取得的成功推断出来的。不少作家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巴那斯派就有“达尔文式的忧虑”。勒贡特·德利尔和自然主义作家一样,都非常注重新获得的科学成果。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取得成功,是与读者对学者的工作深感兴趣并行不悖的。科学院的会议,巴斯德的讲座,克洛德·贝尔纳的课程,科学家给《两世界杂志》写稿,学者、哲学家、医生、文学家在布拉邦的晚宴和玛蒂尔德王妃家里会面,就是科学问题深入到知识领域的标志。杜克海姆的社会学将严密科学的探索方法用于原始社会的研究中。数学家亨利·普安卡雷(1854—1912)在《科学与假设》(1902)等著作中,发展了科学哲学。当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面对人们热衷于科学的潮流,唯灵论、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也占有很大的市场。德国哲学家哈特曼(1842—1906)的《潜意识哲学》(1869)于1877年被译成法文。他将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意志结合在同一个作家身上,称之为潜意识。叔本华的著作从1877年开始被译成法文,影响巨大。他被看做悲观主义大师,他将康德的理想主义和对生活条件的深刻理解对立起来。叔本华重又恢复了思辨哲学。1888年,他的《作为意志和反映的世界》被译成法文,这对唯心主义是一针强心剂。1880年,叔本华的名字口口相传,人们在哲学讲坛上评论他,在沙龙中引用他。叔本华的悲观思想影响了许多作家,如莫泊桑指出:“这个老摧毁者……推翻了信仰、希望、诗意、幻想,毁掉了表面现象,搅乱了心灵的信心,扼杀了爱,打倒了妇女的理想偶像,使心灵的幻想破灭,完成了曾经有过的最大的怀疑论的事业。”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于1889年发表,不过他的影响是1900年他在法兰西学院讲学时开始的,要到20世纪上半叶才显现出来。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与当时流行的思想潮流密不可分。

自然主义是法国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重要文学流派,八九十年代即传出国外,流布世界各国。

【自然主义思潮的思想哲学基础】 自然主义思潮深受实证主义和遗传学说的影响。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的实证主义。他当过几年圣西门的秘书,成为圣西门的弟子。他的代表作是《实证哲学教程》(*Le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6卷, 1830—1842)。这部著作将人类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彼此替换:神学阶段中,现象归于超自然原因的直接作用;形而上学阶段中,纯粹字面上的抽象品质代替了神和魔鬼;最后是实证阶段。19世纪进入了这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的精神放弃了寻找事物的“为什么”,即始因和终极原因:这是决定事物的“怎样”,即联结事物的恒常关系和严密地反映现象之间的关系的法则。人类只需要发现现象的实际法则,即只研究具体的事实和现象,而不用追究事实和现象的本质与规律性。实证一词即“实在”、“确定”、“精确”的意思。孔德认为,这种阐明会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中占据统治地

位;人类可以期望掌握自身的构造和变化。孔德强调艺术要探索人,认为个人的社会性是生理条件所决定的,主张以人的病理状态作为道德研究的基础。孔德的理论传播很快。克洛德·贝尔纳、马尔塞林·贝尔特洛、巴斯德都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实证主义方法。实证主义最后被作家们接受了。

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是最重要的实证主义批评家。实证主义通过他的文学批评,指导作家的写作。他的批评著作在1855—1865年间有很大影响。他的《〈英国文学史〉导论》(1864)提出了著名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的论点,就是从实证主义出发的。种族包含人的先天的、生理的、遗传的和特定的民族诸因素,环境包含物质和社会两重因素,也包括地理气候条件,时代包含文化和当时占优势的观念等因素。他注意到要综合研究人所受到的各种影响,主张要写出特定时代、特定环境和特定类型的人物形象。但他不了解更重要的是人有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而过分强调人的种族因素。他在1861年说:

“我想,凡是有教养和聪明的人,在积聚自己的经验的同时,能写出两三部好小说,因为总而言之,小说只是一堆经验。”他强调的是作家要积累材料。1865年,他说得更清楚:“从小说到批评,再从批评到小说,今天距离不是很大。如果小说竭力表现我们现在的状况,那么批评也竭力表现我们过去的状况。两者如今都是对人、各种事物、各种情势、各种繁荣现象、各种人性的变异作出广泛的调查。就其严肃性、方法、严密精确、未来、希望而言,两者都接近科学。”这段话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作家可以描写各类题材,包括色情,而不必担心受到谴责;他的描写要达到摄影的准确,而风格应放弃传统的躲躲闪闪;道德与文学无关,而只同科学有关。他在《〈英国文学史〉导论》中说:“恶习和美德,如同硫酸和糖一样,都是产品。”左拉将这句令人吃惊的话当作《苔蕾丝·拉甘》第二版的题铭。左拉、莫泊桑、布尔热都将泰纳尊为大师。左拉正是通过他认识了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和福楼拜。法朗士在泰纳逝世时说:“这位强有力的思想家的思想,在1870年左右,让我们激起的强烈激情有一种宗教的感觉。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哲学和历史,是方法和观察,是事实和思想,是历史哲学,最后是科学。”法朗士的话代表了19世纪90年代知识界对泰纳的评价。

病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是当时著名的学者。1855年他在法兰西研究院开设实验医学讲座,尤以研究肝脏的糖合成闻名。他对神经病理学也有深入研究。他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L'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médecine expérimentale*, 1865)中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和基本原则,即生物现象的决定论、生命活动的特殊性、机体正常与不正常活动的规律的同一性。由于这部著作的成功,他进入了法兰西学士院。他的学说以实验方法来对抗片面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他是个自发的唯物论者,他把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称为决定论。他认为在研究任何实物的性质时,必须探讨实物的特性和环境。他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左拉从他那里获得启示,给自己的整套小说冠以

“实验小说”之名。实验并非试验,而是把医学上的一些实例和理论照搬到小说创作中,像医生解剖生物那样用文学分析方法去解剖人的机体、心理以及整个社会的机体。左拉指出:“生理学家和实验医学家的这个梦想,也是将实验方法应用于对人的自然和社会研究的小说家的梦想。一句话,我们是实验的道德家,通过经验指出,在一个社会环境里,一种激情以何种方式表现。”左拉在《实验小说》中照搬了《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的整段文字,然后说这就是他的自然主义的观点,只消把医生改成小说家即可。他在《爱情的一页》的序言中,认为克洛德·贝尔纳的理论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脊柱,这更清楚地说明了实验医学理论对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创作的重要性。

遗传学家吕卡斯(Prosper Lucas, 1805或1808—1885)的《自然遗传论》(*Le Traité de l'hérédité naturelle*, 1847—1850)对左拉的创作有特殊意义。这部著作把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病例都归结为与遗传有关,认为遗传分先天和后天两种,生育具有先天性,但个体存在独特性和个性:遗传可表现在外部相似或内部相似,一个家族成员的过失可以影响整个家族,等等。它的作用几乎包括到社会、政治、世俗等一切方面。左拉几乎把这套观点全盘接受下来。然而当时的遗传学只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不少是站不住脚的。

【自然主义的发展过程】自然主义一词在16世纪已经出现,左拉认为蒙田用这个词时已具有他所说的含义。其实,最初这个词指的是学者从事的博物史工作,然后又指自然科学和生物学。在17世纪,这个词具有了哲学意义。《富尔蒂埃尔词典》(1727)的解释是:“通过机理法则解释现象,不去寻找天生的原因。”到了19世纪,这个词进入美术领域,用来指再现真实的现代绘画。利特雷在《法语词典》中将其解释为:“将一切归于作为第一原则的自然的体系。”圣伯夫也多次提出这个词,不过与左拉关于自然主义的含义有很大差别。巴尔扎克在1845年提出这个词时用的是“博物学家”的意思。波德莱尔在1848年论及巴尔扎克时,这个词可以译为“自然主义者”:他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个学者,一个观察家……一个同样了解思想和可见存在的生成法则的自然主义者”。他把安格尔说成“绘画中自然主义流派最著名的代表”。雨果在《历代传说》的序言中也说,诗人和哲学家力图“将博物学家在动物身上使用的方法用在社会现象上”。左拉在1865年提到这个词时有三方面的含义。1866年,他认为泰纳是一个“自然主义哲学家”,因为他“宣称精神世界服从物质世界的规律,如果想稳步前进,认识人的精神,就要首先找到这些规律”。1868年,他在《苔蕾丝·拉甘》的序中用了“自然主义作家”这个词组。1877年《小酒店》发表时,报纸谈到“自然主义流派”。1880年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出版,向读者证实了这个文学流派的存在。

自然主义是19世纪文学思潮的产物。自然主义本来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拨,可是,左拉最早却是从接受浪漫主义开始踏上写作道路的,他后来的作品其实也没有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相反,倒是存在不少浪漫主义因素。例如,《爱情的一

页》充满抒情意味,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至于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则是非常密切的。自然主义作家对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和福楼拜十分敬仰。左拉认为巴尔扎克“压倒了整个世纪”,“大革命不仅把巴尔扎克变成了一个不自觉的民主派,还把他造就成一个通灵者,一个明天的预言家”;巴尔扎克描绘了整个社会,创建了现代小说,是自然主义小说之父。左拉赞赏斯丹达尔的心理描写和暴露社会黑暗的大无畏精神,也把他看做自然主义小说之父。左拉认为福楼拜是“本世纪的先驱,我们现代世界的画家和哲学家”。他提出自然主义小说要以《包法利夫人》为典范,像福楼拜那样,完全隐藏在叙述后面,做一个冷漠的解剖学家。左拉从浪漫主义转向自然主义的时候,曾经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过明确的评价,他的结论是他的好感在现实主义方面:“我完全接受它的创作方法,即非常坦率地面对自然,把自然整体还原出来,毫无剔除”(《1864年8月18日致瓦拉布雷格的信》)。此外,莫泊桑认为巴尔扎克“创造了极其逼真的整个人类”,是“法国文学之父”。他把斯丹达尔看成“描绘风俗的先驱者”。他是福楼拜的得意弟子,继承了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自然主义的先驱龚古尔兄弟开创了从生理学和病理学方面研究人的先例,为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龚古尔兄弟把目光投向下层人民,注意搜集“人的材料”,对现实主义文学有所发展,这些特点都为左拉所接受。综上所述,自然主义的产生存在一条明显的发展轨迹,它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演变。从某种程度上说,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余绪,也是过渡到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中介。左拉说过:“正是社会促使文学发展。”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是整整一代人思想的产物。左拉还说:“作家不管天分多高,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添砖加瓦,按自己的能力继续盖古老的民族大厦。”左拉断言:“自然主义是新的民主社会的自然产物。”

一般认为,自然主义的形成是在1865—1875年。它的确立是在左拉发表了《实验小说》(1880)和《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两部论文集之际。自然主义文学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盛期。

【思想特点】 自然主义文学在思想内容上有三个特点。第一,它继承19世纪上半叶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和福楼拜的现实主义观点,将写真实和客观性视为文学创作的首要条件。龚古尔兄弟力图描绘“真实的生活”,他们尽力搜集材料,在巴黎郊区作“写生”笔记。他们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的小说是用叙述出来或者根据写生复制的材料写成的,正如历史是用文字材料写成的那样。”他们所写的故事都是在身边发生过的和他们目睹过的,如《热米妮·拉瑟顿》的原型是他们家的一个女仆。左拉在强调写真实方面超过了他们。他认为“一切艺术家都必须研究和再现真实的自然”,他要求作家“把自然如他所见到的那样移植在我们面前”。他又说:“小说家的首要品质是真实感”,而“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和表现自然”。他还认为自然主义小说要“准确地再现生活”。为此,就必须注意环境的作用:“全部活动过程就在于从自然中撷取事实,然后研究事实通过

形势和环境的作用而产生的机制。”强调环境和社会状况的作用，也就是将真实论建立在坚实的唯物史观之上。左拉和龚古尔兄弟一样，提出要运用实证主义批评的方法，获得“人的材料”，研究制约人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包括社会、人情、时代等因素，“内部环境”包括心理和生理等条件。他们指出：“不要夸张，也不要强调，只要事实。”左拉为了弥补生活经历的不足，经常实地调查。除了到发生矿工大罢工的地点去，他还走访工人区、乡村火车站，不断记笔记，需要时还画草图和平面图。他尽量查阅资料，如为了写《小酒店》，他看了德尼·普洛的《崇高或劳动者》(1870)，熟悉了工人的真正世界和他们的切口；有时他只消剪报，如酒精中毒者的女儿比雅尔就是这样写成的。当然，他也走访在小说发生地点生活过的老人，或者询问朋友各种问题。为了写舞台，他曾在剧院后台过了一夜。为了写《巴黎之腹》，他从各个角度记下菜市场一天24小时、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情况。他在看守长的陪伴下参观过地窖，又爬上屋顶，并在巨大的市场里过了一夜，想看看菜农是怎样来到的。他还到警察厅了解菜市场的内部组织，抄下规章制度。在写《娜娜》时，他想知道上层社会的婚礼情况，便写信给出版商的妻子：“在上流社会，结婚时怎样举行舞会？在怎样的晚上？是在结婚之夜还是在去教堂那一夜？……如果完全不能写舞会，我能搬演一个晚会吗？——另一件事：如果这是结婚的晚上，新娘穿什么礼服？如果这是去教堂的晚上，我应该让新婚夫妇在舞会之后就马上按规定去旅行吗？”可见左拉非常重视细节的真实，不敢疏忽大意。左拉对宫廷和大资产阶级的生活并不熟悉，有时他同华丽马车的车夫聊天，今天到一个贵妇人家去拜访，明天又到另一家去赴晚宴。福楼拜曾指点他阅读《一个仆人的回忆》，以了解拿破仑三世的生活和习惯。他所做的搜集材料的工作，是对福楼拜详细地搜集材料和客观地对待描写对象的发展。左拉在《卢贡家族的发迹》中，以143页的篇幅，对普拉桑镇和卢贡家族的起源作了极其详尽而繁琐的考证和描写，就是所谓“科学精确性”的一例。需要指出的是，左拉搜集材料的方法与福楼拜有些区别。他曾经指出，有两种搜集材料的方法，一种是长期了解情况，分多次访问一个地方，甚至住下来，体验那里的居民的生活。另一种是他的方法，即走马看花，带走一个印象。他说：“我不是一个考古学家，要解剖纪念建筑物，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他需要按计划赶速度。莫泊桑虽然也主张“写真实”，不过他不同意要求写出全部真实，而认为“艺术是有选择的、有表现力的真实”；“写真实就是根据事实的一般逻辑，给予现实以完全的幻想，而不是依样画葫芦地将这些事实乱七八糟转写下来”。都德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写生！我从来没有别的工作方法。就像画家仔细地保存速写画册一样，里面有身影、姿势、略图、一个手势，都用写生描画下来。30年来，我搜集了许多小笔记本，上面有见解、想法，有时只有简略的一行文字，能令人想起一个手势、一个音调，随后发展和扩大，达到重要作品的和谐。”但是，自然主义提倡的写真实与斯丹达尔的“镜子论”已有所不同。左拉指出：艺术品是“通过一个气质观察到

的自然的一角”。这里,“通过”、“气质”、“观察到”都带有主观色彩。

第二,自然主义接受了巴尔扎克描写一段历史时期,反映整个社会的成功经验,或者接受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和福楼拜通过人物的一生或一个家族,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的做法。左拉说:“当我着手写一个题材时,我便想将整个世界放进去。”《卢贡-马卡尔家族》描写了第二帝国从建立到崩溃的整个过程,叙述“第二帝国从政变阴谋到色当投降的全部历史”,这是“对一个已经终结了的朝代的写照,对一个充满了疯狂与耻辱的时代的写照”。这套小说涉及政界、宗教界、金融界、商界、矿区、铁路、艺术界、农村、工人生活、战争,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虽然左拉标明写的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其实左拉的描写已经超出了第二帝国,他笔下出现的社会现象应是发生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如《萌芽》是根据1885年在昂赞爆发的大罢工写成的,尽管左拉仍然将故事发生的年代放到第二帝国时期,但这场大罢工深刻反映了第三共和国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出现危机的征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反映面要更广一些,可以说是对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写照。当时,出现了不少社会现象,如大百货公司、铁路营运的发达、煤矿工人的艰辛生活和罢工、股票的涨落和买卖,都是巴尔扎克没有描绘过的,在题材上具有创新意义。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对下层人民十分关注,把他们的贫困生活和犯罪现象当作严重的社会现象来描绘,如把娜娜的堕落与第二帝国上层阶级的腐化联系起来,古波和热尔维丝的堕落是由于工伤事故造成的,责任不在他们。龚古尔兄弟和左拉为此一再受到攻击,他们的描写被指责“不干净”。龚古尔兄弟反驳说,贫困的小人物在文学中应有一席之地;左拉也应战说,他在《小酒店》中“暴露了创伤,强烈地展示了可以治愈的痛苦和恶习”,“使人接近兽类的繁重劳动,使人泄气和寻找消愁解闷方法的微薄工资,终于使小酒店和妓院挤满了人。”他认为“真实的形式使人不自在,人们不能接受不说谎的艺术;读者面对他们每天在生活中毫不厌恶地经历的细节,却感到反感,便是由此而来的”。他明确宣称:“我们要说出人民的真相,让人震惊,为人民喊冤叫屈,减轻人民的痛苦。”左拉不仅描写当时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尽量将这个领域写得完全,无论百货公司、铁路、农村、煤矿,甚至植物园,都是这样。龚古尔兄弟也认为小说家是“现时的历史学家”、“现时的叙述者”,要写出“现代史所包含的真实”。莫泊桑在《漂亮朋友》中深刻地反映了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加紧对非洲殖民地的控制和掠夺的背景下,大财阀如何操纵金融界、新闻界和政界的黑幕,揭露人欲横流和上层人物的堕落。他的短篇小说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诺曼底农村和公务员阶层,颂扬了普法战争中英勇无畏地抗击入侵者的普通法国人,深刻地描绘了19世纪下半叶法国中下层社会的风貌。总之,自然主义者力图写出一部当代社会史,表现这个社会的不同部分,里面是有限的人群,里面是一个阶级,如文人、艺术家、医院的病人、宗教界、资产阶级、人民。就其广度来说,他们不比前辈们逊色。

第三,机械地将自然科学的理论搬到文学创作中,从生理角度去表现人,特别是以当时遗传学的观点去理解促使人行动的原因。爱德蒙·德·龚古尔说:“今日的小说担负着科学研究和科学课题的工作。”又说:“我们的所有作品都建立在神经性疾病上。”《修女菲洛梅娜》写的是鲁昂医院里的故事,勒内·莫普兰是他们童年时的一个女友,热尔维赛太太是他们的一个姑妈,《热米妮·拉瑟顿》包含歇斯底里的分析,作者在展现“爱情的临床学”。左拉认为心理学从属于生理学:“我们的主人公不再是18世纪的纯粹的精神和抽象的人,他是我们当今科学的生理学对象,他由机体组成、参与他每时每刻渗透其中的环境……一切感官要对心灵起作用。在心灵的每一个活动中,它将受到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的影响而或急或缓。在虚空中单独活动的孤立的心灵的概念,变成错误的了。”自然主义小说家特别强调生理条件、环境和情势的影响,认为这决定了人。然而左拉过于强调本能和遗传疾病的作用。他认为遗传是“自然史的全部哲学所在”,认为“应当像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研究非生物及生理学家研究生物那样,去研究性格、感情、人类和社会现象”,实验小说是“以生理学为根据,去研究最复杂、最微妙的器官,处理的是作为人和社会成员的人的最高级行为”。小说家要得出制约个人和社会的法则,成为进步的助手。《苔蕾丝·拉甘》研究气质和机体在环境的压力下的变化,《玛德莱娜·费拉》研究机体的紊乱、失调、幻觉,《卢贡-马卡尔家族》描绘了神经病患者和酒精中毒者的遗传现象,用小说来图解吕卡斯医生在他的著作中叙述的各种遗传病。左拉认为:“人的世界像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一样,服从决定论。”至于实验方法,则是“使人物在一个特殊的故事中活动,以表现一件件事的进行,正如决定论对现象做出的研究所要求的那样”,左拉“在自然中撷取事实,然后研究事实因情势和环境的改变而产生的机械作用,决不偏离自然的法则”。他认为“自然主义小说是小说家依靠观察对人所做的一项真正的实验”。但左拉对自己的观点也并没有绝对把握,他说过:“生成的事实是否被认作绝对真实,这并不重要;这个事实将是一个科学假设,是从医学论文那里借用来的。这个事实一旦提出,我一旦接受它为公理,严密地抽出一整套书,那么这就是绝对真理了。”总之,左拉过高评价了吕卡斯的著作,也机械地搬用了贝尔纳的论断,以致有损于其作品的科学性和艺术价值。

【艺术特点】 自然主义文学在艺术上有四个特点。第一,它力图巨细无遗地描绘现实,排斥虚幻的想象,从而给人一种实录生活和照相式的印象。左拉在《论描写》中说:“自然如此迅猛地闯进我们的作品,把它们都塞满了,有时淹没了人类,吞没和把人物卷到岩石和大树充塞的湍流中。这是不可避免的。”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这些作家,大部分都没有节制,缺乏平衡。对自然的激情往往席卷我们,我们由于繁杂和陶醉于有气派而作出了坏榜样。”自然主义文学往往不分主次地描写。罗兰·巴特称之为“描写的疯狂”,热奈特称之为“道具的迷醉”。左拉提出艺术家只是一名记录员,只需陈述事实,对自然不作任何改变和